

# 中原时评

■个论

## 不能让信息公开“等来等去”

与中央公开透明的行政体制改革坚定决心相比,不少地方在政务公开时喜欢遮遮掩掩。编制预算说明时,谈到资金结转、预算支出时动辄在“亿元”单位后边加个“等”;在预算执行情况报告里,蜻蜓点水列出一个支出项目,用“等等”代替几十个项目“鱼目混珠”的情况比比皆是。(3月20日新华社)

新华社这篇报道,还真道出了一个“人人眼中有、个个笔下无”的现象。现实生活中还真就是这样,翻看各种生僻的概念和名词,还有着各式各样的“等等”。不用说一般百姓了,即使一些有着专业背景的人,也很难看懂明白。每年都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,吐槽报告看不懂,呼吁报告的“白话文运动”,讲的也是这么一层意思。

“等等”,到底“等”什么?到底遮掩了什么?很多人对此想入非非。想象未必是真实,再貌似真实也未必是真实。公允地分析,预算报告出现的“等等”,有一些技术的原因。众所周知,在写作中,为了方便读者阅读,在使用数字时一般不连续使用3个。同样,出于行文精

的需要,无法把项目一一列举,很难把数字全部标出,这时报告使用“等”就是技术需要。

除此之外,还存在一些动机的原因。换句话说,有些内容很复杂,里面的水很深,问题难以启齿,不便公之于众,于是用“等等”来避实就虚。一位审计署驻地特派办的人士介绍,一些政府的财务数据中简单列举一下再加个“等等”,主要是为了模糊处理。这位人士透露,“以前我查过一个案子,有个单位明明10个人去外地开会,结果列了几个人加上‘等等’说成200个人,多报住宿费来冲减餐饮旅游费用。一个‘等等’背后,可能就是个集体腐败案件”。这里可能比较极端一些。不能说所有的“等等”都隐藏腐败,但“等等”是“有故事的”,却是不争的现实。

虽然有着多种原因,未必都是不可告人,可是原因躲在背后,你不站出来说明,谁知道真相是什么?而社会发展到今天,听到了那么多的“权力故事”,很多人已经形成了“习见”甚至“偏见”。即使站出来说明了,又有多少人相信?所以说,面对报告中的“等等”,公众很可能

“不问青红皂白”,会“遵循旧例”地从最坏处考虑,把里面想得特别腌臢特别不堪。“等来等去”,不仅带来了公众监督难,而且给政府公信力带来了伤害,实在是一大遗憾。

当前,改作风蔚然成风。文风也是作风,报告自当尽量避免“等等”。即使出于行文考虑,“等等”也应该有补救措施。从公开的内容上讲,一要坚持全面性,尽量公开全部内容;二要坚持关注性,对公众感兴趣的内容,要明确而详细地公布;三要坚持互补性,有一些内容不便出现在纸质报告中,那就把内容上网,便于公众网上搜索。这也是全国人大代表、《广州律师》杂志主编陈舒所建议的,“能否像查个人银行卡信息一样,在网上打造起一个政务信息的公众查询平台?这样的话,群众监督才能有穿透力”。

李克强总理指出,实施全面规范、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,“让群众看明白、能监督”。而面对一份“等来等去”的报告,谁能够看明白?依据这份报告去监督,又从何着力?站在这一高度,不能让公众知情权“等来等去”,不能让信息公开“等来等去”。□毛建国

■街谈

## 打车软件测试“市场软件”

继禁止早晚高峰使用打车软件之后,上海市有关部门要求打车软件与强生、大众、锦江、海博四家出租车公司电调平台进行对接。某打车软件公司的高管称,某些电调平台已开始向打车软件公司“收租子”,而且要求他们“按单数进贡”。据了解,工信部已介入调查。(3月20日《中国青年报》)

打车软件的出现,改变了出租车行业内部的利益结构,打破了出租车行业管理的壁垒,使得行业供求关系在垄断语境下,呈现出更多市场调节的特点,从而导致一些管控规则的失灵。这才是出租车公司真正不愿意看到的,也恰恰说明市场对于促进消费公平具有能动作用。

出租车行业与打车软件公司之间,应当是双向的关系,用与不用谁的打车软件或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,问题是打车软件的便利性,让消费者与服务直接供给者成了博弈最大的筹码。这意味着,只要消费者与出租车司机在诸多功能的选择中找到契合点,来自于行业与管理层面上的“抢逼围”其实是没有作用的。毕竟,打车软件是一个信息平台,是基于网络存在的,完全可以不依附出租车行业的资源,同时,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打车软件是信息技术的禁区。而当前,打车软件的竞争乱象,并不源于出租车行业的壁垒,而是软件公司为占领市场相互打起了优惠战。

当然,出租车行业可以通过对出租车司机的管理,来应对打车软件形成的冲击,这是合理的市场行

为。问题是,相关政府部门的加入,在市场博弈中伸进了一只行政的手,从限制到收编,再到纵容出租车公司利用打车软件牟利,既有习惯行政管控社会秩序的思维惯性,用行政命令来打补丁,也有部门利益绑架催生拉“偏架”的冲动。

相关部门的行为,使得博弈偏离了市场公平,而且以行政命令的方式,强制打车软件归属于行业,既没有法律依据,也超越了部门的权限。在看似强而有力的表象之下,不难看出其实是外强中干。这些表明,市场的作用使得政府对行业单纯行政管理的手段已经不适应,既管不了也管不好,相反被利益所左右牵着鼻子走。

从市场秩序的层面来看,打车软件正在测试着“市场软件”。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,关键在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,把行政干预的阻力降低到最小,使得政府之于市场变成单纯的“裁判”关系。打车软件市场博弈证明,“进一步简政放权”,不仅是消除市场环境障碍的必由之路,而且证明如何消除部门利益壁垒,还是促进简政放权的前置条件。无疑,在推动了政府转变职能的同时,既要对权力进行规范,在进一步完善市场规则的前提下,将权力固化在法治的轨道内,法不禁止的,任何权力做出的政令可以视作无效形成定律。同时,也要将那些像出租车一样的,完全可以由市场调节的行业推向市场,廓清部门的利益关系。

□木须虫

■个论

## “傻子也不会等信息联网被查”如何接招?

全国住房信息联网再次提出时间表,即到2020年前实现,舆论认为此举有助于反腐和降房价。但是,理想很丰满,现实却可能很骨感。“谁会等着联网后上面查到自己,傻子也不会这么干。”广东某市一位国税局官员向记者透露,他的房产已处置完毕,目前名下只剩一套房,他认识的很多官员也已陆续通过各种方式将房产处置,有多套房产的官员会卖掉大部分,或者更名转移,最多留一两套。(3月20日《华夏时报》)

将房子处理完毕就可高枕无忧吗?处理房产,不外乎两种手段。一是销售,一套房子几百万,十套房子就是数千万,这惊人的销售所得如何处理,存银行还是存亲戚家?一些官员腐败后,其不明财产不是被发现了么?另一种是“把房子转移到相熟的人代持,通过这种隐蔽手段,财富实际还控制在自己手里”,这种方法也不牢靠,反腐部门想查也不难查到。

当然,一些官员早就多个心眼儿,一开始就不透露实名,正如该国税局官员所透露,“级别较高、职位较为

敏感的领导干部,一开始房产证就不可能写自己的名字,房屋出售时官员无需出面。即便是其名下房产,委托给中介时也不会暴露自己身份。”即便如此,只要反腐不放松,这些官员也难逃法律之网。

“傻子也不会等信息联网被查”,说者无心,但听者不能无意,这句话不正是一种提醒吗?提醒职能部门早应对,全国住房信息联网尽快落地,如果等到2020年才实现,持有多套住房的官员早就抛房了,即便信息联网也失去了一大意义。应该说,全国住房信息联网的目的并非反腐,亦不是降房价,但客观上具有反腐之效,何不尽快推动?住房信息联网并不需要多么复杂的技术含量,只要有决心,短期内即可实现,去年2月,住建部相关负责人表示,在40个城市的住房信息联网完成后,将在2013年6月底把住房信息联网工程扩展到500个城市。但是大限早已过去,该计划却爽约。个中原因,不难推断。

其实,即便住房信息联网了,也不等于公众可以随时随地查到住房信息,根据

住建部制定的《个人住房信息系统使用管理暂行办法》,住房信息联网的查询服务坚持属地查询的原则,查询权的实施主体明确为地方政府。换言之,不是谁想查住房信息就有资格查,就能顺利查到。即便如此,一些官员仍然设置有形无形的障碍,就更值得强力推动了。有学者认为,破解住房信息联网的难题,应从健全法律入手,就住房信息的提供主体、提供内容、提供时限、法律责任等作出明确规定。既然住房信息联网难以单兵突进,就必须辅之严格的配套措施和严厉的制度推力,不仅使住房信息尽快联网,还要确保住房信息准确全面。

不动产登记,紧扣了大众情绪的脉动;住房信息联网,可看作反腐网络的一部分,它们都承担了公众的反腐期待。祛除信息孤岛,减少监督盲区,通过准确掌握官员的住房情况,也可精准反腐。因此,“傻子也不会等信息联网被查”,就需要相关部门接招。“魔高一尺道高一丈”,除了加紧联网之外,还应该重点捕“鱼”,查一查相关官员的房子究竟转移到哪里去了。□王石川

■街谈

## 给公开公务员工资福利点个“赞”

近日,北京市各区县陆续公布2014年预算,石景山区31个部门还公布了在职人员的工资福利情况。有媒体报道称,根据2014年预算,石景山区八宝山街道办事处共有在职人员97名,工资福利总支出2078.2万元,人均高达21.42万元。对此,石景山区政府回应称“这是媒体对数据的误读”:各街道公布的工资福利总支出,不仅包括在职人员的工资福利,而且包括街道所辖各社区的社工和协管员的工资福利,因此,用“工资福利总支出”除以“在职人数”得出的数字,远远高于工作人员的实际所得。(3月20日《新京报》)

人均工资福利高达21.42万元,的确令人咋舌,难怪引得网友一片哗然,群情激愤。好在,这只是个误会,而且很快得以澄清。这件事提醒有关部门,在公开预决算时要尽可能详细,把情况说清楚,以免产生歧义和误会。

实际上,不管石景山区各部门的工资福利高不高,他们能之向社会公开,本身就值得称赞。目前,各地各部门三公经费公开已成常态,但预算决算公开尚未全面铺开,一些部门即使公开预决算也大多是粗线条,甚至用“等等”来鱼目混珠、掩盖问题,极少有部门将工资福利单列出来,以至于绝大多数地方公职人员的工资福利还是一个秘密。前不久,湖南冷水江市财政统发工资信息被曝光,引起舆论强烈反响,但众所周知,那只是意外“事故”导致的“被公开”。在这个意义上,石景山区各部门主动将高“敏感”的工资福利晒出来,接受民众监督和

评议,可谓带了一个好头。

公开公务员工资福利不应只是些政府部门的自觉行动,而应成为一种制度化、常态化的要求。首先,这是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需要。公务员的工资福利来自财政拨款,花的是纳税人的钱,向纳税人公开明细账,是政府部门的本分和义务。其次,这是落实公众监督权的需要。公务员的工资福利合理与否,是否存在“权力自肥”、违规违纪问题,需要引入公众监督,而公开是监督的前提,正如财政部在相关文件中所强调的:“预决算信息公开是最有力的反腐措施。”再次,这是消除误会和隔阂、取信于民的需要。当公务员工资福利成为秘密,人们难免凭想象去猜测,各种传言引发民众的不信任感和焦虑情绪。而公开公务员工资福利,正如冷水江市财政统发工资被意外曝光一样,不仅没有带来负面影响,反而收获了公众的理解和信任。

今年全国两会期间,公务员工资该不该上涨成为会上会下热议的话题,国家公务员局党组书记兼副局长杨士秋表示:“公务员工资应该上涨,已责成有关部门进行调研。”确实,有些地方的基层公务员工资不高,而且多年未涨,随着GDP、物价以及各行各业收入上涨,给收入较低的公务员涨工资未尝不可。但是,公务员涨工资应以收入公开透明为前提,即在公开公务员工资福利的基础上,再讨论该不该涨工资以及涨多少为宜。只有这样,公务员涨工资才名正言顺,赢得民众的理解和支持。□浦江潮